

程方 马亮宽 著

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
Fu Sinian

大刀王五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家精要

傅斯年

程方 马亮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6N14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 / 程方, 马亮宽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5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830-3

I. ①傅… II. ①程… ②马… III. ①傅斯年(1896—1950)—传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4950号

傅斯年 FU SINIAN

程 方 马亮宽 著

责任编辑 宋媛媛

特邀编辑 仲济云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830-3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或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家世与求学之路 / 001

一、家世与童年 / 001

二、京津求学 / 007

三、留学欧洲 / 019

第2章 创办史语所 / 025

一、筹办史语所 / 025

二、汇聚英才 / 027

三、史语所的工作旨趣 / 030

四、领导史语所迁徙 / 033

五、殷墟发掘 / 038

六、城子崖发掘 / 044

七、整理大内档案 / 046

第3章 学林霸才 / 051

一、史料学派的主帅 / 051

- 二、历史研究 / 060
- 三、跨学科综合研究 / 064
- 四、古文化研究 / 069

第4章 书生报国 / 075

- 一、《东北史纲》 / 075
- 二、参与《独立评论》 / 079
- 三、讨奸御寇 / 084
- 四、讨伐孔祥熙 / 088
- 五、炮轰宋子文 / 093
- 六、访问延安 / 097
- 七、参与旧政协会议 / 101
- 八、政治抉择 / 106
- 九、自由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 110

第5章 教育实践与思想的成熟 / 117

- 一、兼理北大文科研究所 / 117
- 二、代理北大校长 / 120
- 三、主政台湾大学 / 130
- 四、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 138

附录

- 年谱 / 152
- 参考书目 / 154

第1章

家世与求学之路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傅斯年在家乡生活了十三年，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后在其父生前好友、学生的资助下，赴津求学，初步接受了新式中等教育。1913年，傅斯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新思想的震荡下，很快由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转变为新文化的开拓者，由传统价值观念的卫道士转变为科学、民主、自由的积极鼓吹者。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欧洲留学生活。早年的求学经历，使傅斯年学贯中西，识见广博，为他一生的志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家世与童年

鲁西望族

傅斯年的故乡聊城位于鲁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华北平原上的重镇，此后一直为华北平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明清时期，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聊城而过，因其北通京

师、南连三吴的优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贸易中心。一时间，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当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聊城一直为黄河北部三大商埠之一，被史家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

发达的交通，繁荣的经济，孕育出昌盛的文化。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四方鸿儒，数不清的文人骚客往返其间，游览观光，既传播了学术，交流了信息，又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东昌府进士二百九十人，状元三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五十五人，状元二人。明清时期的聊城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

傅家是聊城的名门望族。据傅氏族谱记载，傅斯年远祖名叫傅回，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任满准备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傅回没有办法，便和四个儿子南归，留下三个儿子侍奉夫人。这三个儿子一人定居冠县，一人定居博平，另外一人名傅祥，定居聊城。

傅祥五传至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门庭，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7岁入塾馆，曾师从于当时名儒孙兴，对义理之学造诣颇深。然而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考取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第

二年便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入关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弘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顺治十一年（1654）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内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五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的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的有一百多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继勋，字玉溪，号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道光五年（1825）拔贡，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桢都是他的门生。傅继勋有七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从傅淦开始，这一家族分支开始趋于衰落。

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精通医道，且长于武技。他17岁时被选为拔贡，但从此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举。傅淦重孝悌，分家时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他的妻子是山东潍县陈阡的女儿陈梅。陈阡时任江西巡抚，给女儿的嫁妆很丰厚，但傅淦不善理家，又轻财好施，不久便典当一空，一贫如洗。从富贵之家一下子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傅淦，只能靠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贴补

家用。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伯隽，号晓麓，生于同治五年（1866）。傅旭安自幼勤学好问，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遂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脩养家糊口。傅旭安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学习的。家境的贫寒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养成了关心、同情社会下层的品德；同时，也激励着这个聪明、要强的少年奋发读书，终成一代学术大师。

家学与家教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在傅斯年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和母亲。

傅淦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乐善好施且极富正气，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典型代表。傅淦晚年曾因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外谋职以养家。此时，曾是其父傅继勋门生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了解到傅淦家的实际困难，来信让傅淦去天津一趟，打算为其谋个差事。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最终赴津一行。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正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李鸿章安排他住进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后，第

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李鸿章慢待自己，便于次日一早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他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由此可见傅洞性格孤傲、重气节的一面。据记载，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远出，以含饴弄孙为乐。由于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早逝，“傅淦便直接做了孙子的老师”，对其学问督导甚严，由此打下了傅斯年坚实的国学基础。

傅斯年三四岁时，傅淦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儿童启蒙读物。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孟真四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由于良好的国学功底，在小学堂读书的日子里，傅斯年学习成绩始终都是最好的。据他儿时的同窗回忆，傅斯年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在一起读书，他读到哪里，就能背到哪里，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在学生当中，朱笠升年龄最大，被称为“大学长”，但功课不是很好，一有问题就向傅斯年请教，时间久了，傅斯年便戏称他是自己的“大徒弟”。但对自己爱孙寄予厚望的傅淦总担心傅斯年入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傅斯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在11岁时已读完了十三经，并且大部分章节能够背诵。

傅淦对傅斯年早年的教诲，对其一生影响颇深。除了传统知识的灌输，傅淦也把传统的伦理观念、文人气节及做人的道理传给了他。傅斯年成年后经常对其弟弟傅斯岩说：“祖父生

前所教我们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光绪三十年（1904），傅旭安病歿于任所，终年39岁。傅斯年时年7岁，其弟傅斯岩不满1岁。傅旭安的去世，使其一家失去了支柱，也断绝了生活来源。傅旭安的夫人李氏顾不上悲伤，便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李夫人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贤孝识大体。丈夫过世后，李夫人既要奉养年事已高的公婆，又要抚育年幼的双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对朋友、学生待之以诚，他去世后，朋友、学生对傅家极为关心。他们共同凑了一些钱，托其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代存生息，维持傅家生计。弟子们感念老师恩德，每年春节前都会派一个代表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家存一些银两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能坐吃山空，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李夫人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以解燃眉之急。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也没钱修补。一到下雨的时候，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即使是在这样的家境下，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绝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二人如有过错，马上就会受到责罚。傅斯年一生都很敬畏母亲，即使成名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等到母亲怒气渐消后，他才温言劝说解释。

二、京津求学

天津求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傅斯年离开聊城去天津求学。此次天津之行可视为傅斯年人生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傅斯年得以赴天津求学，受益于其父亲傅旭安早年结下的一段善缘。傅旭安出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走，跨进一家商店。商店冷冷清清，顾客很少，一个眉清目秀的学徒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通过攀谈，他得知此人叫侯延壤，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由于酷爱读书，经常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傅旭安对侯延壤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经常在学业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光绪二十五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壤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自己负责解决。在傅旭安的严格督导下，侯延壤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适逢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侯延壤一举中举；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壤重情义，对恩师的提携之恩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谒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前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发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壤比傅斯年大二十五岁，视傅斯年为子弟。在与傅斯年交谈中，侯延壤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

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少年。当时正值新学潮大兴之时，而聊城因运河的衰落已经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僻处鲁西一隅，与外界接触几乎中断。侯延壤认为傅斯年如长期待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侯延壤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不久，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壤带傅斯年到天津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于是，侯延壤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商议，接受了侯延壤的建议。

有机会到大城市求学，接受新式教育，对求知欲极强的傅斯年来说，自是兴奋异常。光绪三十四年冬到达天津后，因学校尚不到招生时间，傅斯年便暂时住在英敛之家里补习功课，生活费用由侯延壤负担，不足时，其父生前好友吴树堂等人给予接济。次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后，便搬到学校住宿，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傅斯年在天津四年半的求学时间里，系统地接受了近代新式中等教育，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扩展了知识视野，为后来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节假日，傅斯年经常到英敛之家做客。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加入天主教，长期与洋人、传教士接触，思想比较开明，与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维新派人物，如严复、张謇、梁启超等过从甚密，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并任经理，渐入社会上流。英敛之非常

喜欢傅斯年。每次见面，14岁的傅斯年像个小大人似的和英敛之谈论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英敛之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孩子非同一般，见解精辟，眼光独到，看问题深刻而老成。同许多关心、爱护傅斯年的师长们一样，英敛之对他寄予了厚望。英敛之的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出身皇族，为人随和，毫无贵妇人的架子，也非常喜欢傅斯年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她和丈夫一样，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给傅斯年讲天主教义，星期天带着他到教堂做礼拜。在英夫人影响下，傅斯年一生虽未入教，但对教会人士印象不错，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这与他早年结识教会人士有直接的关系。

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期间受英敛之夫妇的影响是短暂的，而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壤。侯延壤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壤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与梁启超等人关系密切，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壤经常写信给他，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开导和劝诱他，教诲他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壤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壤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使之在天津得以系统地接受新式教育，所学课程基本是科学基础知识，特别是能有机会阅读在家乡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大大开拓了其知识视野，为其进一步求学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傅斯年无论是在天津、北京大学读书，还是出国留学、归国工作，侯延壤都给予了傅斯年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傅斯

年也始终以父执事之。侯延壤晚年定居济南从事公共慈善事业，傅斯年经常前去探望。抗日战争期间，侯延壤因老病留在济南，傅斯年寄钱接济，奉养终老。侯延壤与傅斯年父子两代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仁义道德文化培育的典型范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北大熔铸

1913年夏，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当时，北京大学的学制分为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级别。预科为三年，分甲乙两部，甲部重理，乙部重文。傅斯年国学根基扎实，且有志于文史研究，便欣然选择了乙部。

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并不衔接，有相对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傅斯年尽管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外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要在短期内精通，做到流畅、不费力地阅读外文原著，仍有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功课，这使傅斯年必须努力学习，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傅斯年一如既往，刻苦学习。同时，北大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也为这个求知若渴的少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游弋。由于他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为乙部的第一名。他的同学毛子水回忆说：“傅先生入乙部，虽身体羸弱，时常闹病，但成绩仍是全部的第一。就我现在所记到而言，当时全校学生中，似乎没有比他天资更好的。”

1916年暑假，傅斯年预科毕业，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

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傅斯年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出于他对传统国学的热爱，想以此作为自己的托身之所，毕生努力探索研究。傅斯年的同学毛子水记述说：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唯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

傅斯年对章氏的崇信情结可以追溯到在北大读预科时。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醉心于复辟称帝，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这一反动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孔教会”“尊孔会”等组织如雨后毒菇一样纷纷冒出来，尊孔复古的逆流像瘟疫一般在全国蔓延。章太炎对此痛心疾首，公开指斥那些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甚至亲自跑到总统府门口，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章太炎的这一行动大受傅斯年尊崇，而当时对章氏的学问更是心悦诚服。章太炎师从俞樾，与戴震、王念孙等古文经学大师一脉相承，对儒学经典主张“实事求是”，以文字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释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从文字语言所留存的“痕迹”中去寻找“无形大史”，即要“将经当历史看”，也就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六经皆史”，经书即史书。章氏的这些见解和治学方法对傅斯年影响极大，以至于若干年后，在他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中还能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这个时期，北大文科章太炎学派力量颇盛，其得意门生如刘师培、黄侃、朱希祖、马裕藻等一大批国学大师也都在该校执教。有了这样良好的外部条件，再加上自己对章氏的尊崇和对国学的热爱，傅斯年便自然把国学门作为首选。

傅斯年升本科初期，努力攻读古文经学，尤其深入学习章